

阶层分析家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知名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照片: IMF PHOTO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的童年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 1968 年的那场抗议活动。当时，学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校园，高举写着“打倒红色资产阶级”的标语。

目前，米兰诺维奇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主讲经济学。据他回忆，他当时在想自己的家庭是否属于那个臭名昭著的集团。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与当时南斯拉夫的很多孩子不同，米兰诺维奇拥有属于自己的卧室——在一个名义上无阶级的社会中，这象征着一种特权。那年夏天他和朋友们在校园周围闲逛时看到有学生在炫耀红色的卡尔·马克思徽章。对于那种兴奋感，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米兰诺维奇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想我后来对于那些抗议活动的社会及政治影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即便如此，在他探求知识的过程中，“1968 年在很多方面堪称一个分水岭”。如今，他已成为不平等问题的知名学者。在不平等成为经济学领域热点问题的几十年前，他就选择了这个主题作为自己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今天，米兰诺维奇最出名的研究是他在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间对全球收入不平等进行的突破性研究。这段时期大致始于柏林墙的倒塌（这意味着欧洲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止于全球金融危机。

2013 年，米兰诺维奇与克里斯多夫·拉克纳 (Christoph Lakner) 合作完成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所谓的“大象曲线”。这种曲线因其外形而得名 (见图)。该文章说明，20 年来 (也就是米兰诺维奇所称的“高度全球化”时期) 急剧增加的财富未能在世界各地得到平均分配。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产阶级 (主要在亚洲) 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全球收入最高的 1% 的人 (“全球富豪”) 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同时，发达国家中下阶层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大象曲线的优势在于它的简洁。它很好地总结了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强烈不满的原因。这种不满情绪使得政界中的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的事业如日中天，也使贸易壁垒和限制移民的呼声日渐高涨。

畅销书《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说：“布兰科对全球不平等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尤其是体现在他有关大象曲线

的研究成果上。大象曲线为未来的研究定了调。”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证实了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发现，1980—2016 年与全球收入最低的 50% 人群相比，收入最高的 1% 人群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是前者的两倍。

皮凯蒂说，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成果“似乎要比最初的设想更让人吃惊。这头大象看起来更像是头猛犸象。”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不屑一顾。很多经济学家都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神秘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理论之中。这种人的唯一特性就是希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人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足轻重。多样性无足轻重。只有平均水平才是关键。

在这个充斥着相同的理性参与者的世界中，供需力量施展其魔法，决定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及数量，同时能最大限度地造福整个社会。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只是市场力量的副产品。

“市场解决了一切问题。”米兰诺维奇说，“因此，这个题目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

随后，2008 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他说，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收入最高的 1% 或 5% 人群在收入增长方面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

数据爆炸也成为推动不平等问题的积极因素。通过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挖掘，从而更容易地将毫无特点的消费者和工人划分成具有共同特点的群体。他说，大数据“使得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来讲，不平等就是一种异质性。”

数据一直是米兰诺维奇热衷的研究领域。除此之外，在布鲁塞尔读中学期间，他对社会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身为经济学家的父亲曾在布鲁塞尔担任南斯拉夫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使。

“布鲁塞尔的中学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我想，这跟法国的中学一样。”他这样说道。

他的同学分成两派：左翼孩子和“资产阶级”孩子。前者深受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作为代表表面上看似工人阶级政府的享有外交官特权的人之子，年轻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并不属于任何一派。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情况。”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米兰诺维奇起初对哲学情有独钟，可后来他认定经济学更实用一些。此外，经济学可以让他将自己对统计学和社会阶层的兴趣结合起来。

在攻读研究生时，他获得了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除了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歧视之外，让他难忘的是美国社会的富足——大量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续杯的咖啡以及大轿车。

两年后，他回到贝尔格莱德，潜心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不平等。他采用的是一位在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工作的朋友提供的难得一见的家庭调查数据。

除了他决定不加入共产党之外，他的博士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南斯拉夫令人震惊。这篇论文也为他开启了在世界银行研究局长达 20 年的职业生涯。

“布兰科的确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知名专家之一，即便在当时也是如此。”艾伦·盖尔布 (Alan Gelb) 说道。他聘请米兰诺维奇加入了一个小分队，

主要研究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各国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米兰诺维奇重点研究贫穷和收入分配问题。

世界银行收集的大量数据堪称是极其珍贵的资源。凭借这些数据，米兰诺维奇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跨国比较。这在学术界尚属新事物。1995 年的一天，米兰诺维奇与他的部门主管、盖尔布的继任者谈到这个问题。

“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瞧，现在我们手头上有世界各地的数据，但我们只研究单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过。’”四年后，他根据家庭研究的结果，发布了第一份有关全球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

在随后的几年里，米兰诺维奇发布了大量涉及面很广的研究报告。除了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经济体进行研究外，他继续研究不平等问题及其与全球化的联系。他的文章和著作展现了他各种广泛的研究兴趣，包括历史、文学和体育。

在一篇文章中，他估算了公元 1000 年拜占庭时期的平均收入和不平等情况。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足球领域（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体育项目）内劳动力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他发现，由于欧洲十几个顶级球队资金实力雄厚，能招募到世界最杰出的球员，因此足球俱乐部变得极为不平等。另一方面，足球运动员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各国足球队之间的不平等。其原因是，那些小国家的球员可以在顶级俱乐部的球队中提高自己的球技，然后他们回国，为自己的国家队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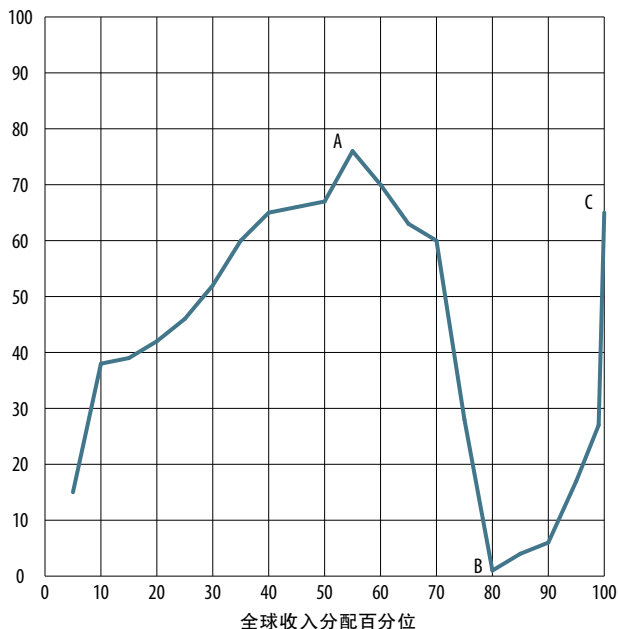
他的妻子米歇尔·德·纳维尔 (Michele de Nevers) 是全球发展中心气候融资方面的专家。他经常与妻子讨论文学问题。他从中获得了灵感，撰写了一篇颇有新意的文章，对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部名著既在探讨金钱，也在探讨爱情。他估算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收入，分析了财富如何影响奥斯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选择生活伴侣的决定。

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相同的研究。这两篇论文收录在米兰诺维奇 2011 年的著作《富与贫：全球不平等简史》(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中。

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

不平等的分配

1998—2008 年收入增幅最大的群体大约分布在全球收入分配第 50 个百分点 (A 点)，出现在最富有的 1% 人群中 (C 点)。收入增幅最小的群体大约分布在全球收入分配第 80 个百分点 (B 点)。他们大都是发达经济体的中下阶层。



资料来源：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注：PPP=购买力平价。

的新途径》(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堪称里程碑之作。这本书包含了 他多年来对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间 不平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

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平等的扩大 之势不可阻挡。但米兰诺维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 受到他所说的良性因素和恶性因素的影响,不平等会 呈波浪式或周期性变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发 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直到战争和恶性通 胀彻底摧毁了财富,进而缩小了这种差距。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像累进税制、更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以及教 育的大众化趋势这样一些良性因素缩小了贫富差距。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分水岭。在中国实施对外开 放之际,这个历史事件使得前苏联阵营国家融入全球 经济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 贫富差距。在这些国家,随着富有阶层的壮大,中产 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

未来会怎样呢?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未来是美好的。这些国家将不断追 赶那些富有的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前景似乎更 严峻一些。

在发达国家,全球化进程和科技创新这两股力量 将持续挤压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由于牢不可破的精 英集团更容易接受费用较高的高等教育,而且可以通过 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制定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 策,如有利的税制,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将出现向 下的态势。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紧张和政治争夺将会 加剧。自本书问世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 欧和法国的抗议活动)证实了这个预测。米兰诺维奇担 心这种摩擦可能会导致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割裂”,从而 形成美国的富豪统治以及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

过去十年间,虽然有关不平等的争论一直很激烈, 但在政策方面“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他说,“我们 如同坐在一个自动驾驶的车上,它很可能将带领我们 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解决不平等的常规方法是收入的再分配,不过它 不会像过去那样行得通了。这是因为资本的流动性会 使富人将自己的收入藏在避税港。相反,政策应该将目 标放在“禀赋”(如财富和交易)的再分配上。具体措 施可以包括提高遗产税、鼓励企业将股份分配给员工

的政策,以及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资金投入。

“我们不可能在一夜间实现这一切。”他说,“但我 想,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希望走向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世界——在那里,财富会比今天得到更公平地分配。”

米兰诺维奇探讨了各国间的不平等这个令人不满 的问题。据他计算,与一个出生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 相比,一个美国人仅凭出生在美国这一点便可拥有比前 者高出 92 倍的收入。这便是米兰诺维奇所说的“公民 权溢价”。随着那些出生在穷国的人寻找出路,这便造 成了移民压力。

米兰诺维奇认为,阻止移民和阻止商品或资金的 流动一样是徒劳的。然而,指望发达国家的公民开放 国家边界也是不切实际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让 更多的移民充分享有公民权,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也许可以向他们征税,用税金来补偿那些失业的公民。

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当前的研究工作让他将目光 再次投向了祖国南斯拉夫。他还研究了中国的阶 层结构,尤其是深入分析了处于收入分配前 5% 的人群。 这成为他的下一部著作《孤单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的一部分。这本书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种 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将与那些历史悠久的自由资 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紧张 和政治争夺将会加剧。发生的一些 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和法国的 抗议活动)证实了这个预测。

有关不平等的研究将走向何方呢?得益于新数据 的大量出现,米兰诺维奇发现了两个前沿领域:一个 是财富不均(如皮凯蒂);另一个是代际不平等,这是 诸如哈佛大学的哈吉·柴提(Raj Chetty)等经济学家 研究的课题。

他说,这两个领域“吸引着那些如今拥有强烈社 会意识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他们很聪明,希望研究 一些有难度的课题。”他补充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非常乐观。”^[1]

克里斯·威利兹(CHRIS WELLISZ)是《金融与发展》 的工作人员。